

绪 论

哈尔滨俄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 哈尔滨曾是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 游牧民族那种‘逐水草而居’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间相互频繁的冲突以及征战所导致的‘旋兴旋灭’使这里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都较中原地区为晚。

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 哈尔滨又曾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① 这便使得这里的开发与建设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里自1898年被确定为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后，在现今的市区内曾有相当部分是类似于租界性质的‘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成为当时脱离清廷控制的‘国中之国’。大量的俄侨麇集在这里 通过中东铁路进行商品倾销或资源掠夺，很快便把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拉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同时，以中东铁路为媒介亦传入了西方文明，成为推动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社会变革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因此，“哈尔滨俄侨”现象便成为一个独特的不得不加以注目并深入研究的社会历史现象。

哈尔滨俄侨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与中国近代社会文明转型分不开的。在西方列强频频叩关的炮火中，在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 在洋务运动及维新人士‘自强求富’的呐喊声中 哈尔滨亦同全国一样，迈出了其屈辱与悲怆的社会近代化步伐。哈尔滨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60页。

俄侨产生的历史背景，便是西方列强于近代瓜分中国的缩影写真，亦使这个在自然经济和北方民族文明轨道上运行了数千年的区域开始楔入了外来的新因素；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

一、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此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西方列强倚恃不平等条约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列强对华的商品倾销，使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结构逐步瓦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在先进的机器产品打击排挤下纷纷破产。这种情况，最先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显露出来。例如 厦门地方开埠仅一年 即因洋布的输入而使“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 商人多不贩运 而闽浙之土布、土棉 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 因上海的开埠，原是棉布业中心的苏松地区，亦随之出现“布市销减 蚕棉得岁丰而皆不偿本 商贾不行 生计路绌”。^③ 西方列强对华的商品倾销 用洋纱代替土纱 使中国社会传统的纺与织分离 用洋布代替土布 又使耕与织分离 最终导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 and 无数个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者的破产。在江苏川沙县“自洋纱盛行 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 弃焉若忘 幼弱女子亦无有习之者”；^④ 松江县“因洋布充斥 而女红之利减矣”嘉定县“往者匹夫匹妇 五口之家 日织一匹 赢钱百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1845年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敬敷奏文》，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

④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4页。

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① 在浙江“，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耕夫馊妇，周体洋布”。^② 在广东“，因有大量洋纱进口，土纱的纺织已经几乎停止了”。^③ 在广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织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在乡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④ 在贵州“，因洋纱的输入，完全排斥了手纺土纱，今日差不多走到任何一家农户都可看到，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⑤ 在山东“，据说棉纱进口增加，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这项纺纱业是许多贫困妇女的靠山”。^⑥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商品倾销种类的日益增多，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的情形，在其他手工业行业中也显露出来并日益严重。如进口洋糖排斥着国内的制糖业“，洋糖盛行，土糖碍销，各地糖行多有亏损歇业”。^⑦ 进口的蓝靛排挤中国的土靛“，自靛油输入，种蓝者日少”。^⑧ 以及洋针排挤土针，洋伞排挤土伞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凡是在有外国商品倾销的地方，相应的中国手工业产品都要遭到程度不同的排挤与打击，正所谓“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⑨ 足见，在西方列强商品倾销的打击下，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叩开了古老的中国封闭的大门，正在到处寻找商品市场的西方列强，从此开始把这个庞大的帝国置于他们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3页。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5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7页。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9页。

⑤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4页。

⑥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08页。

⑦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

⑧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398页。

⑨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

的影响之下。但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活动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过渡，其经济侵略活动又有了膨胀、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制占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①此时争相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在组织对华商品倾销的同时，资本输出亦开始逐年增加。所谓资本输出，“有两种基本形式：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借贷资本的输出是贷款给别国政府、城市或银行。生产资本的输出是在国外创办工业企业、租让企业、建筑铁路 在被削弱的国家中贱价收购已有的企业”。^②

在生产资本的输出方面，可从宏观上以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限，划为前后两个阶段。因为在这个条约里规定增开通商口岸，迫使清政府解除了机器进口的禁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就地设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在西方列强对华“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以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方式迫使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给外国资本的涌入提供了“合法”的机会。此种时限划分只是比较而言，实际上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前 列强虽未取得在中国设厂的权利，但设厂活动早已开始。据有的著作估计，到 1894 年止，外国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将近 2000 万元 设立企业 191 家。在这些企业中，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企业就有 116 个 投资额达 1500 万元 占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构成甲午战后外国在华投资两大支柱的棉纺织业和煤矿业，这时已显露出较大的发展势头。基础设施投资亦有了初步尝试 到 1894 年为止 共有 14 家外资轮船公司在华设立 其中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好的有太古、怡和、日清三家。初建于 1876 年的淞沪铁路线尽管里程很短，但到 1894 年全国已有铁路三百六十多公里。^③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

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249 页。

③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176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提供了机会。在 1895 年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急于输出资本的西方列强在华掀起了投资侵略高潮。以基础设施建设的铁路投资为例，由外国直接修筑的铁路有：沙俄的中东铁路（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1897 年开工，1903 年通车）南满铁路（长春——大连，1897 年开工，1903 年通车，1905 年转让给日本）德国的胶济铁路（胶州——济南，1899 年开工，1904 年通车）法国的滇越铁路（昆明——河口，1904 年通车）日本的安奉铁路（安东——奉天，1904 年开工，1905 年通车），由外国贷款给清政府修筑的铁路有京奉铁路（英国，1878 年开工，1912 年全线通车）京汉铁路（英、法，1898 年开工，1906 年通车）粤汉铁路（英、美、法、德 1901 年开工，1936 年全线通车）津浦铁路（英、德，1908 年开工，1911 年通车）沪宁铁路（英国，1904 年开工，1908 年通车）吉长铁路（日本，1909 年开工，1912 年通车）广九铁路（英国，1907 年开工，1911 年通车）等等。到 1911 年为止，中国境内共有铁路 9618.1 公里，其中由外国直接投资修筑的有 5192.78 公里，采用间接投资方式的有 3759.7 公里，而用中国资本修筑的仅为 665.62 公里，只占铁路总数的 6.9%。^①在航运业方面，无论是资本规模还是经营业绩，外国资本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在长江航线上，太古、怡和、日清三家外资轮船公司占了轮船吨位的 70%~80%，至于远洋航线中国更是无力经营。棉纺织业和煤炭开采业亦是外商投资热点，到 1913 年前中国商办的 18 家纱厂就有 4 家被外资吞并，在外资 2 356 404 枚纱锭中，吞并华资纱厂的就达 770 664 枚之多。^②显然，外国资本在华势力的扩展，是以中国民族资本的相对衰落为前提的。

在借贷资本的输出方面，西方列强亦显示出了空前的“热情”，其中特别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便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现象，他们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177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064 页。

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就“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早在 1848 年，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亚银行分行，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外资银行。1867 年英国在上海设立了汇丰银行分行，1875 年又设立了麦加利银行分行。1889 年德国在上海设立了德华银行。这些银行随即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支行，形成了庞大的金融机构网。以英国银行为例，“它在中国支店的数目，1870 年 17 个，1880 年有 19 个，1890 年有 30 个 联合资本在 1880 年时即达到 1681 万英镑”。^① 在这些银行中，以汇丰银行的势力为最大 是全中国银行事业的垄断巨头；它在 1880 年 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但对它的主要批评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的财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②

整个 19 世纪 有 21 个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开设银行。其中总行设在中国者，有英国的汇丰银行和德国的德华银行，另有上海租界内的两家小银行。其余的银行，总行都设在本国，在中国的是它们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连同总行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括代理在内 前前后后共计 101 处 分布的城市 北起哈尔滨 南至海口 包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 20 个大城市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辐射网。^③ 其中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国的道胜、法国的东方汇理、日本的横滨、美国的花旗等等，都是当时实力非常雄厚的银行。这些银行一方面贷款给各洋行，以操纵中国的进出

① 季南：《1880 年—1885 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 269 页，1939 年英文版。

② 季南：《1880 年—1885 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 269 页，1939 年英文版。

③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载《历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口贸易，另一方面则通过大量的借贷以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改变了过去以大洋行为主体的所谓“商业大王”的垄断局面，使大批的小洋行在中国出现。据资料记载，在 1864 年至 1894 年间各国在华商行及侨民的状况为：英国于各商埠有 299 个商行和 2070 个侨民，美国有 31 个商行和 469 个侨民，德国有 64 个商行和 364 个侨民，法国有 20 个商行和 228 个侨民，俄国有 16 个商行和 170 个侨民，日本有两个商行和 61 个侨民。加上其他国家，总计各商埠有 451 个商行和 3995 个侨民，其中英国商行占 66%，侨民占 52%。^① 在这些商行里，每个商行平均不足 10 人，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属于上面提到的“小洋行”。然而，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为这些小洋行进入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如上海利杭洋行 Milson and Told 老板多德所说：“像日常所周转的这样大量的进货，商人不从银行那里取得贷款是无法进行的。”^② 可见，小洋行已经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摧毁了商业大王的垄断”，^③ 对本已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外国资本积极对中国金融市场进行参预。在投资与汇兑的两大业务之外，各银行在对中国政府的外债争夺上显得尤为激烈。在甲午战争以前的 40 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大约共计 4600 万两。而 1895 年后的三十余年里，中国政府的外债则数以亿计。^④ 这些外债主要来自世界金融市场，而实现这一债务的则主要是外国在华银行^⑤。

西方列强金融资本的对华输出，不仅垄断了外资和汇兑业务，而且还发行货币使其金融渗透的力量大大加强。在清末民初时，

① 季南：《1880 年—1885 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 252 页，1939 年英文版。

②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73 年 4 月 22 日，第 367 页。

③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载《历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④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统计资料》，第 145 页，1962 年版。

⑤ 汪敬虞：《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银行团》，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中国的有产阶级，尤其是政府官员、买办和新兴军阀，特别愿意到外国银行去存款，因为外国银行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以致后来由中国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根本无法与这些外资银行一争短长。“银行系统的成熟，使金融渗透的力度大大加强。随着实业借款的逐渐增多，外资银行对中国实业建设的渗透力量也日渐加强，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日见显著”。^①

这样，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使中国近代的各种主要经济利益，几乎全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它作为外国资本的进益源流，溢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轨道。在外国资本的榨取和掠夺下，中国大量的财富源源流往国外；“贱去昂来，剥削日极”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境地。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近现代事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洋务运动的影响

从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间经过了 35 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这 35 年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这个雄视世界千年、夜郎自大、自我陶醉的“天朝上国”渐从梦幻中醒来，步履蹒跚地由传统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击，使中国兴起了“洋务”思潮。在统治集团内部，如奕訢、文祥、桂良等中枢执政大臣改变了过去一味排外、顽固保守的政策，以较现实的态度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地方上也出现了一批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成长起来的汉族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出身于士人阶层，曾经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率军与太平军作战中，他们开始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 180 页。

接触西方，并最先把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付之于实践。在奕訢等执政大臣的支持下，他们开始购买洋枪洋炮，并设厂仿造西洋舰、枪炮，以“自强”为口号搞起洋务运动。在这些官吏的周围聚集着一批支持、辅助他们办“洋务”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有理论有实践的“洋务人才”。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他们兴办“洋务”，广采“西学”，呼吁“借法自强”，在全国形成了一股洋务思潮。洋务运动自 60 年代兴起以后，上有统治集团中强有力的洋务官吏倡导，下有开明人士的积极呼应，使其影响日渐扩大。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以官办、商办、官督商办等各种形式建立起来。其中较为著名的军事工业及重要企业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 年）、金陵机器局（1865 年）、福州船政局（1866 年）、天津机器局（1867 年）、轮船招商局（1872 年）、开平矿务局（1877 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 年）、兰州机器织呢局（1880 年）、唐山胥各庄铁路（1881 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 年）、天津铁路公司（1887 年）、湖北炼铁厂（1888 年）、湖北织布局（1890 年）、华新纺织新局（1891 年）、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894 年）等。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的统计，仅在 1872 年至 1894 年间，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共设立了 74 个厂矿，资本共计 21 636 838 元。^① 而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早期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先后创办达 388 家，分布在机器修造、缫丝、棉毛纺织、轮船、铁路、电报、煤炭、钢铁等近 20 个行业中，实有资本数达到五千多万元。它们与军事工业一起以一亿五千多万银元的投资规模，初步构成了中国早期的近代工业群体，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基本内容。^②

^① 牟安世：《洋务运动》第 1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讨论综述》载《历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伴随着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发展，对西学的传播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外人士翻译介绍西学的书籍大量增加。在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三十多年间，总数已达上千种，内容十分广泛，这些书籍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西学知识来源。因而，知识分子谈西学、讲洋务的内容亦日益丰富多样了。在这股思潮中，涌现出一批洋务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等。他们撰文著述，集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构成了洋务思潮的主流。特别是这些洋务思想家，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开始摆脱传统观念，萌生出“借法”、“变法”面向现代的新意识、新观念。如冯桂芬认为，中国若不力谋自强，前途是很可悲的，那时不仅会有俄、英、法、美等国来欺负我们，“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悲怆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中国的落后，冯桂芬认为有几点不如“外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所以他大声疾呼：“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① 提倡及早“变法师夷”，显示出其除旧布新、兼收并蓄以求中国富强的救国热忱。又如，面对如何使中国免除亡国之厄运，王韬等人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变法。1867 年王韬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时局来看，中外通商将是不可逆转之大势，此时再空谈“徙戎攘夷”只会变成不通事物变化之道的“愚儒”，吾恐不待百年，轮船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所以“豪杰之士”只有及早“握此一常之道”，中国才能走向富强。^② 再如，面对世界新形势，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即由各国的相互隔绝时代变为互相“联属”的时代。他们认为，导致这种时代变动的原因是各国工业发展、商务发达，使“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② 王韬：《弢园尺牍》。

运”。^① 通商贸易是沟通各国的桥梁，联系世界的纽带。过去“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②“划疆自守，不相往来”，“今则百货流通，各商云集”。^③ 尤其是这些人还初步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当今工商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必然趋势。薛福成说：“余观火轮舟车之迅捷，因念人心由拙而巧，风气由朴而华，固系宇宙间必然之理”。^④ 郑观应亦说：“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故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⑤ 这种对世界大势发展的认识，过去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因而亦有人说，洋务运动中的激进思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⑥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适应‘洋务’建设的需要，洋务派及洋务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洋务派人士余贻范在《论西学宜设特科》文中说得至为明白：“制造无才也，而器械不精，格致无才也，而水陆诸军教练必延蕃将；综核无才也，而海关各税总理须用西官。人才之乏，兹富强之所由不效也”，^⑦ 以此来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然而，深谙在中国变革之难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对此说得更为含蓄，他在“科举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弄人之道”的立论下去阐述自己的理由。他在《筹办海防折》文中力言：“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为主，施之于在所必办的各项洋务——轮船、制器、铁路、电报、陈兵——隔膜太甚，应该另开洋务进取一科，造就人材；遂之建议海防各省均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由懂洋务的官吏主之，延聘外国人执教”。^⑧ 李鸿

①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论商政》。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

④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

⑥ 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二。

⑧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章虚与委蛇的态度，可说是懂得时势又深知中国社会的大吏最为典型的表现。尽管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负令人窒息，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洋务派的倡导下，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得以创办并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到废止科举前的 1904 年时，全国已有各类学堂 4222 所，在校学生 92 000 余人。到 1909 年时，学堂增至 52 343 所，学生数为 156 万多人。^① 这组数字，反映出自洋务运动始新式学堂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春笋之状。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器，兴起于西方列强武力胁迫下的口岸开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就洋务运动的本身来说，它是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大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变化的转折点，是把科学技术从经学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转折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但是，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化启动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近代化相比有着许多不同：

（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化是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中国则不然，当时中国没有“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又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无力承担实现近代化的使命；封建势力中的顽固派更不能担此重任。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发展趋势迫使中国人做出选择时，开创近代化道路的历史使命便自然地落到了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身上。

（二）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一般是由轻工业开始，继而发展重工业，在民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军事工业。中国则不同，当时清政府面临双重压力，外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顺序是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 217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版。

（三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一般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的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工业化则基本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随着社会条件的逐步成熟，并出现了官督商办和商办形式的企业。^①正是以洋务运动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这些特点，才使其出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难抉择，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以及传统因素的正负效应等问题。

中国近代化运动过程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和促进国家的民主、独立和富强，除了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恶劣的国内外环境，又决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社会环境的重重矛盾，使中国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西方列强的叩关炮火，惊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酣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行中外比较后，都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结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则使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成为现实。近代企业的创办，西方科技的引进，“自觉地引入了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无论是率先发轫的洋务派，还是继之而起的维新派、立宪派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管其在救国方略中互相抨击、分歧甚远，但贯穿始终的相同点都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这表明了爱国的仁人志士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大声疾呼，或身体力行，前赴后继，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

然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终究是一部令人黯然神伤的

^① 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失败记录。原因即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很快就形成了外国资本、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多重结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倚恃着武力通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外国资本都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与摧残力量。而在中国，本国资本中又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即是洋务运动中的官办近代工业它依附于反动的政治统治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则一直是在外国资本、封建官僚资本压制排斥、摧残的夹缝中生存。恶劣的环境使民族资本畸形、孱弱未老先衰，以致于从来没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过主导作用。在中国近代资本多重结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优势地位、发展速度及力量增长诸方面总是按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顺序排列的。1894年外国资本占近代中国资本总额的60.7%洋务民用企业资本仅及外国资本的一半，却比民族资本高出近4倍。^①与政治强权紧密结合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成为民族资本发展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基本上扼杀了民族资本正常发展的可能性，使之一直无法改变在近代中国资本结构中的末名地位。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二元特征，是先进的近代工业与落后的传统经济的并存。它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线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②这一论述，充分表现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

版。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2页。

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空间断裂，左右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基本格局和最终走向。即便是在沿海城市内部，其经济结构亦显现出了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掠夺了传统部门，并且是在传统行业衰败破产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的。尽管如此，中国却远未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仍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直到 20 世纪初，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很小部分，居于主体地位的仍是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封建经济，其两翼是传统手工业和旧式商业。在行业之间，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相互协调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行业内部亦是新旧生产方式并用，资本主义经营的高级形态、低级形态和前资本主义经营形态并行，近代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操作并举，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并存，由此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三、传统文化的正负效应

中国社会发生剧变之日，亦是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之时。如何对待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保持传统文化在“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上，历史地形成了晚清文化论坛的争论中心。以“体”和“用”一类范畴去界定“中学”和“西学”的性能并依此确立对待两者的基本准则的“中体西用说”构成了这一社会剧变时期新型文化思潮的通行模式。

洋务运动中“富强”观念的提出是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对传统价值观冲击的产物，民族危机是引起价值观念转变的启动器和催化剂。在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因遭受西方侵略而激发出的民族情感也强化了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在屡战屡败“器不如人”的情况下，中国人必然把保存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支撑民族自尊自信的心理基础。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对西方列强行径的道德反感，也强化了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认同。如此，

守旧顽固派尚且不论，即便是在洋务派身上亦是“尚富强”的价值观与“礼仪至上”的传统伦理交织在一起。这两种价值观的并立，使洋务思想跌宕牴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兼容二者的“中体西用”理论模式应运而生。在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人士共同的理论纲领。“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省略式 最早是由洋务知识分子冯桂芬提出来的 他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言论 可谓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框架。这一理论 后来被洋务知识分子和洋务大员们普遍接受并有所发展。如郑观应的“中学其本也 西学之末也 主以中学 辅以西学”，^① 王韬的“器则取诸西国 道则备自当”，^② 薛福成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③ 特别是洋务大吏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纵论了中学、西学的体用关系后说：西学东渐以来，世道确实大变，“今欲强中国 存中学 则不得不讲西学”。认为西学不仅包括制造坚船利炮的学问 也应包括“西政、西艺、西史”学习这些东西“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张之洞还说：处于当今“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变局之中，要保国保教保种，就必须坚持中学。凡治学者，应“先以中学固其根底”，“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而后才能讲求西学。所以他的结论是：“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 西学应世事”。总之，“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指导思想。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挑战，使洋务运动期间产生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但这一折衷的理论模式并非一帆风顺 它遭到了“重义理轻艺事”和“贵义贱利”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击。大学士倭仁在反对创办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说：“立国

郑观应：《盛世危言》。

王韬：《菉园文集外编》。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之道当以礼仪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这段话最为典型地代表了恪守非功利主义儒学思想的一派人观点。在他们看来，孔孟尧舜之道已是足以教化百代、臣服万邦的精神力量，完全不必再去搞些“形而下”的“奇技淫巧”坏了人们的心术。还有人说：“立国贵善用所长，制敌要先知所畏。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人之所贵在人心”；人若不明大义，虽机智多警，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①

可见，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交锋是十分激烈的。顽固派利用“圣贤之道”对洋务派违背传统的举止进行诘难，常使其处于被动的困窘境地。而洋务专家、西学人才的世俗身份，又使他们因背离了传统士人的规范而受到士林的排斥。他们的社会价值只能在很小的洋务圈子里得到承认，而在整个士人阶层中则被看成是“异己”、“浊流”。这种现实的困境加剧了洋务派的分裂，亦是洋务运动夭折的原因之一。

四、帝俄的对外扩张与中东铁路的修筑

在 1840 年以前，尽管沙皇俄国早已开始了对华的侵略扩张，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就中俄两国关系来说，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而鸦片战争后，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沙皇俄国，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已经毫无平等的关系可言，中国成了沙俄掠夺、宰割的对象。俄中两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而这与沙俄的对外扩张政策是紧密相连的。

19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正处于农奴制危机日益加剧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从 19 世纪上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 121 页。